

單向街 005

纪录 | 探索 | 批评



反智的年代

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014013758

C53
391

單向街 | 005 |



C53
391



北航

C17007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向街 005 / 许知远主编.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95-4701-2

I. ①单… II. ①许…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4683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出品人: 刘瑞琳

责任编辑: 孟凡礼

装帧设计: 彭振威

内文制作: 马志方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89mm×1270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168 千字 图片: 10 幅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 0539-2925888



北航

C1700716

撰稿者

刘易斯·拉伯姆 (Lewis H. Lapham, 1935—)，美国作家、公共知识分子，曾长期担任《哈泼斯杂志》主编，2007年创办《拉帕姆季刊》。

耶夫根尼·莫洛佐夫 (Evgeny Morozov)，记者，白俄罗斯博客写手，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最近的作品是《定势效应：互联网自由和公共事件的阴暗面》。

谢丁，《时尚先生》主笔，专注于非虚构报道工作。最新出版有《困死局外》。

张克纯，1980年生于四川。现居成都。自幼学习美术，曾从事设计工作，现为自由摄影师。2008年在《华夏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获得自然类摄影一等奖，作品《地震中的狗》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国际评选中夺得自然类国际大奖。

张泉，1982年生于青岛，复旦大学文学硕士。现任《生活》杂志副主编。最新出版有《城殇》。

蒂莫西·加顿艾什 (Timothy Garton Ash, 1955—)，英国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圣安东尼学院以赛亚·伯林教授研究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定期为《卫报》、《泰晤士报》、《独立报》、《纽约书评》杂志撰稿。出版有多本政治学著作，被称为“共产主义体制和后共产转型的研究专家”。

帕拉维·艾亚尔 (Pallavi Aiyar)，印度Hindu报业集团驻北京记者。她先后就读于新德里的圣斯蒂芬学院、牛津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主修哲学、历史和传媒

社会学。2008年，她根据自己在中国的五年经历，出版了《烟与镜：亲历中国》（*Smoke and Mirrors, An Experience of China*）一书。

沈诞琦，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硕士在读。曾在美国联邦储蓄所波士顿分行担任宏观经济政策分析研究工作。近年来做了一系列普林斯顿校友的访谈。

索马里，从事媒体行业，致力于写作、翻译及学术工作。现居北京。

胡晴昉，作家，延续着西方作家如波德莱尔、本雅明，以及卡尔维诺的系列城市观察。现居台湾。

梁鸿，1973年生于河南邓州。200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文艺思潮研究，曾出版《中国在梁庄》。现任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

陈河，首届“郁达夫小说奖”、“华人华侨文学奖主体最佳作品奖”获得者，旅居加拿大。出国前当兵，办企业，做过温州作协领导；远走阿尔巴尼亚后，做小贩，卖药品，开饭馆，还遭遇过绑架。现从事写作。

方翌，安徽合肥人，高中毕业后赴美求学，本科毕业后在英国攻读硕士学位。现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攻读法律硕士（J.D.）学位。参与编辑出版《东方历史评论》。

【专题】

- 002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许知远
007 对过去事物的无知 刘易斯·拉伯姆
020 苹果的完美骗局 耶夫根尼·莫洛佐夫
036 时代的病人 谢丁

【访谈】

- 052 寻访五四——舒衡哲访谈 张泉
065 正视传统的负担——宇文所安：回归历史现场 张泉

【纪录】

- 078 印度记者在中国 帕拉维·艾亚尔
097 档案：被监视的个人史 蒂莫西·加顿·艾什
115 回声 唐汀
135 旧金山的犀牛 沈诞琦
151 躺椅上的精神分析家 索马里

【影像】

- 176 北方的河 朱墨 张克纯

【随笔】

- 188 一个都市人的童年 胡晴舫
198 现代都市里的算命人 梁鸿
218 为何写作 陈河
225 我的大学 方墨

[专题]

- 002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撰文：许知远
- 007 对过去事物的无知
撰文：刘易斯·拉伯姆 翻译：胡新宇
- 020 苹果的完美骗局
撰文：耶夫根尼·莫洛佐夫 翻译：潘爱娟
- 036 时代的病人
撰文：谢丁

重建知识分子传统

撰文：许知远

更多的知识匠人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无力对变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在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价值混乱中，我们听不到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思维上的普遍混乱与平庸状态，不断提醒人们，整个社会是多么需要知识分子与他们所代表的气质。

“（他们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哈耶克是二十世纪最有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抨击者之一，尽管他在后半生成为该行列中最著名的一员。记者、教师与媒体代表，这些经典的公共知识分子类型，在顽固的哈耶克眼中，就是那些“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在战后那场席卷世界的集体主义潮流中，势单力薄的哈耶克发现这些一知半解的公共知识分子占据着舆论的中心，做出煞有介事却漏洞百出的判断，在整个三四十年代，那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醉心于斯大林的改革与凯恩斯的方案。

在这种意义上，理查德·波斯纳，美国杰出的联邦法官、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不可置信的高产作家，是哈耶克的继承者。在2002年出版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书中，他继续鄙夷这些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他坚持，专家不应该超越自己的专业发表言论，而那些依靠媒体与出版业生存的所谓知识分子则沦为市场的奴隶，他们的工作质量不敢恭维。他举例说，那些广泛谈论微软反垄断案的“媒体权威”其实根本不了解关键问题所在。同样，

广受欢迎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在写作科普读物时也不该涉及人工智能问题，因为他并不了解……总之，受人尊敬的专家兼公众知识分子理查德·波斯纳，除了饶有兴致地为最受媒体与观众欢迎的公众知识分子列出排行榜外（亨利·基辛格名列第一），还提出了这样的警告：不要自作聪明，对超出专业范围的议题发言。“很不幸，波斯纳同样没办法证明他是知识分子问题的权威”，拉塞尔·雅克比在《洛杉矶时报》书评上反唇相讥。

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拉塞尔·雅克比表达了对美国知识界更深的忧虑，即真正的危机是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正在消失，它被专业化程度过高、狭隘的学院专家们取代。雅克比心目中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丹尼尔·贝尔、加尔布雷斯、特里林为代表的纽约文人圈。他们用优雅、清晰的笔调关注广阔的问题，致力于为有教养的人群写作，而如今的专家们的意见只有少数的同行可以理解。判断知识分子的标准何在？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法国人班达的定义更具感染力：“他们的本质不是追求实用的目的，而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的思索中寻求乐趣，简言之，就是寻求拥有非物质方面的利益，因此也在用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在这个定义之中，所谓公众知识分子或是学院分子、记者还是大学教授这样的角色定义失去了意义。

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丹尼尔·贝尔这样描述现代文化的特性——宫廷乐师、行吟诗人与修道院的僧侣如今变成广告撰稿人、专栏作家与公共形象设计者。被长期拘禁在牢狱中的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葛兰西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以更开放的心态

扩大了知识分子的范畴。除了传统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创造了“有机知识分子”这一名词,它意指伴随商业社会而生的人员,他们可能是工业技术人员、政治经济专家、律师,他们的工作更多是运用智力而非体力,葛兰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判断在今天显得更为准确。彼得·德鲁克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知识型社会,伴随着官僚体制的崩溃,人们越来越从刻板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他们有了更多的自由,而新型的工作也需要更多的激情、创意。刚刚过去的 dot-com 风潮似乎正暗示了这股新潮流。彼得·圣吉所说的“学习型组织”风靡全球,学习变成了不倦的、终身性的工作,六十年代的西方青年喜欢说“人人都是艺术家”,我们今天是否可以说“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爱德华·萨义德在 BBC 电台的里斯讲座上讲,纯属个人或纯属公众的知识分子都不存在,只要你用文字表达,就意味着进入公众视野。兴趣广泛而优雅的萨义德得出了自由的知识分子定义:“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约瑟夫·康拉德将文学创造比作黑暗中的救援工作,作家将人们从无意识的黑暗状态中拯救出来。而在班达·雅克比与萨义德心目中,知识分子则一直在打破日常生活的平庸与乏味,他们的武器是强烈的好奇心,而敌人则是一切循规蹈矩与面目可憎的重复,他们力图赋予暗淡的现实生活以意义。

让我们回到哈耶克与波斯纳的嘲讽,我承认他们的批评都有道理,他们厌恶的是那些未经过思考便盲从既有观念的应声筒。但是,他们的偏激(尤其是波斯纳)妨碍了他们看到更深的危机,知识分子的真正陷阱是沦入过度专业化与技术化的陷阱,失去了

对更广阔世界的好奇心。他们不是过度传播新观念，而是对新观念浑然不觉。况且，我们不应要求每一位活跃思考的知识分子都作出正确的判断，他们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持不停地思考。

当这场争论跳跃到中国的语境时，我们则面临更加复杂的状况。长期以来，我们将知识分子的角色混同于各种类型的技术专家、工程师、医生或是社会学教授，只要他们占有专业知识、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就是知识分子。但同时我也要承认，将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过于理想化同样是个错误，一些中国学者顽固地将之塑造成类似索尔仁尼琴那样的异议分子，他们只强调知识分子批判性的一面，却忽略了批判本身并非目的，而当为了批判而批判时，批判本身就成了一种机械的重复，它失去了知识分子最珍贵的思考与创造精神。

作为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长并成熟起来的中国青年来说，他们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气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我们是怎样度过大学时代的——那些陈旧的教材和日复一日被转述的陈腐的知识。我甚至可以不无粗暴地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大学生其实从未接触过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我们被教会背诵、服从、考试，而缺乏奇思异想的能力。更多的知识匠人代替了知识分子，他们无力对变化的外部世界做出反应。在转型期必然出现的价值混乱中，我们听不到他们清晰有力的声音。

“大学不再像过去那样受人青睐。”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安东尼·吉登斯说，大学不再是知识生产的唯一中心，它拥有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它们是思想库、研究代理商、调查代理商、管理咨询公司和媒体公司等等。而在令拉塞尔·雅可比憧憬不已的美

国知识分子的黄金年代中，很多杰出知识分子是为《时代》、《新共和》这样的杂志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学院工作会束缚他们的创造力。而在中国，更尴尬的是，当我们的大学仍未拥有（或恢复）它的知识中心的地位时，类似思想库、媒体这样的竞争对手也未成熟。思维上的普遍混乱与平庸状态，不断提醒人们，整个社会是多么需要知识分子与他们所代表的气质。或许，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们还拥有李泽厚、刘再复，拥有“走向未来丛书”，鼓舞了社会最活跃的阶层更广泛地参与知识或公共事务讨论。

“《时代》对于美国教育的作用大于美国所有教育系统的总和”，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赫钦斯对于亨利·卢梭所创办的杂志的影响力的评价，鼓舞了我曾服务的《经济观察报》的成长。我们目睹着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间的高速变化，伴随着各种新观念与名词的出现是深刻的文化断裂感，尽管一个在更广阔的知识背景哺育下的群体正在形成，但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在中国社会同样显著。虽然我们有时候带有明显的令哈耶克唾弃的“在有了些道听途说的科学知识以后，便自封为现代思想的代表……肩负着向公众提供新观念责任的人”的气质，不过，比这种轻蔑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中国自由讨论的气氛。我不喜欢公众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就像我前面得出的结论，只有低级知识分子（知识匠人）与高级知识分子的区别，而没有个体知识分子与公众知识分子的差异。我也同意人们通常对新闻业的评价，“它天生追逐权力、金钱与戏剧”。但比起这一切弱点，我们最为看中的一点仍是，我们是否鼓舞起你对世界的广泛的兴趣？

对过去事物的无知

撰文：刘易斯·拉伯姆 (Lewis H. Lapham)

翻译：胡新宇

那么一般说来，历史是什么呢？一段大家都认同的寓言故事。

——拿破仑

曾经有位政治竞选人许诺要“夺回美国”，我不禁思绪万千：夺到哪里去？从谁手里夺回？夺回后用什么方式运送？是重登五月花号，还是在枪口的指令下？如果说夺“回到那群山草原上的家”，就像那首老牛仔歌唱的，鹿和羚羊是否还在和印第安拉科塔人玩耍呢？如果是从腐败政客和吸血鬼资本家的手中夺回，那么爱默生是不是要赴华盛顿执政，而绰号“海军中将”的实业家范德比尔特则要被关进大牢呢？

这些问题关涉美国人集体意识中对历史的绮丽幻想。若换由那些热衷于复兴伟大美国的人来问，它们还会引发进一步讨论，主题则上至联邦党人文件，下至福克斯新闻频道。

美国启蒙已然失落，在过去三十年中，徘徊在其棺架边的哀悼者一直把这一责任归咎于电视和学校体系。无论冬夏，或晴或雨，他们都聚集在大学体育馆或会议中心，但这群渐渐沦为文盲的民众已经暴露了他们的层次——他们对美国历史的了解同对古埃及或现代乌兹别克斯坦的了解一样贫乏：76%的大学生不知道《权利法案》的内容，73%的受访者搞不清四十年冷战时期美

国的对手究竟是谁。

有关讨论渐渐集中到一个问题上：一个被剥夺记忆的国家会面临什么样的厄运？大家都会纷纷谴责，曾经存在过的受教育的普罗大众如今已荡然无存，但同时，大家又承认这一损失和美国人的精神气质在某种方式是统一的——没有耐性、充满进取心、急步向前的人民普遍认为过去无关紧要，他们都会认同亨利·福特的那个论断：“历史差不多就是胡说八道。”这真是奇耻大辱，可是，只要佛罗里达州的橄榄球教练还在拿着比大学一整个古典系所有员工还要高的薪水，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我并非不相信数据，只是觉得数据与间接证据不合。州政府里到处都是致力于保护历史遗迹的官员，电影和电视屏幕上充斥着历史纪录片和历史传奇剧，畅销书单上也不乏华盛顿、林肯或西奥多·罗斯福的传记，而每年夏天，宾西法尼亚州的郊野都会挤满一万三千名志愿者，他们穿着内战时的军装，重演着葛底斯堡战役。

大众对美国历史的偶像化想象是如此生动，但问题在于，美国人认为过去仅是造梦的材料，草秸被编织为黄金，这种历史总是为电视台在黄金时段制造的神话做好了播出准备，而电视台制造的神话自然有其受青睐的、更为利润丰厚的市场。

那么，如果历史不能为竞选造势，不能吹破华尔街的经济泡沫，也不能为这个国家的战争负责，为什么还要为其用途作辩护呢？简洁的答案来自威廉·福克纳：“历史从未死去。它甚至还没有过去。”而如果要详尽地解答这个问题，我会借助1956年秋天身为美国学生的自己在剑桥大学学到的一点教训。过去的五十六年中，

我不止一次将其作为对福克纳命题的论证讲述出来。

早在耶鲁大学时，教授们就曾鼓励我去谋一份历史学家的差事。在他们的怂恿下，我不禁认为自己当时颇为时髦、列入教学科目的研究论题有着明确的把握。提起某位已逝诗人或失位国王的名字，我就能不负众望地将其与特定的时代精神关联起来：诗人与革命相连、国王则和隐喻有关。

我在剑桥大学的导师很高兴知道这一点。是的，嗯，他说，我明白，说得不错，不过，或许你愿意抽出点时间来谈一谈十二世纪，比如托勒密的宇宙体系如何对应着阿姆斯特丹运河的规划？

我还记得那个场景：潮湿的天气，配着松脆饼的茶，年代久远的壁炉中煤火正旺。在列举完那些早已被强调过的显著事物之后，导师为我俩又各泡了一杯茶，为我端上李子饼，或许还有一杯雪利酒，看起来极为客气。他问起了那些可能被忽略的、关涉十二世纪的问题。上莱茵河与下莱茵河流域的流通货币各是什么？陆路从巴黎到米兰、海路从马赛到多佛的旅行耗时各是多少？罗马和巴格达，哪一座城市集中了更多的财富、促生了更大规模的宗教迷信呢？在拜占庭城，罗刹国来的毛皮和基督徒奴隶的要价和出价又是多少？

对这些，我甚至无法给出一个大胆而无望的猜测。那位剑桥导师带着轻微的遗憾默默自语。是的，嗯，他说，你们美国人拥有化约宏大主题的天赋，可我们英格兰这边的可怜亲戚却办不到。你知道，在构建起那些宏伟的框架之前，我们希望至少能粗略地了解一些事实依据。他说，这是一件乏味的事情，并且非常耗时。

在剑桥大学的一年终结了我成为一名历史教授的任何想法——我不愿意学中世纪德语，父母也不愿意为这种学习提供经济支持——不过，这一年倒让我充分地理解了托马斯·杰斐逊那句名言中的真理：“一点点真正的历史是如此难得，因而它永远有价值。”人如果不是生活在由重塑过往而造成的茅屋中，还能生活在哪里呢？除了过去，人还能改变什么呢？未来是不存在的，而此刻则来无踪去无影。

历史是进行中的工作，是持续不断对过去的撰写和重写，这跟那些展示在博物馆里的奶白色大理石雕塑截然不同。如果我们阅读三部讲述大英帝国历史的书籍，其中一部出版于1850年，另外两部分别于1900年、1950年问世，我们就会发现三个不同的大英帝国。当然，无论是哪部，太阳最终还是落了下来。在这三部书里，那些观光客必看的景点依然未变：马背上的拿破仑还在滑铁卢那儿，维多利亚女王在白金汉宫加冕，南亚次大陆还牢牢泊定在印度洋岸边，只是，我们看拿破仑、女王和印度的眼光不一样了。

每个时代都会修订它对过去的构想以迎合其处境，而总体来说，历史学家总会找到那些验证其论述的史实。历史不是发生于两百年或两千年前的事实，它是有关两百年或两千年前所发生之事的一个故事。故事会变，讲故事人的眼界也会不同。

我不是隶属于终身雇用职位的学者，所以我并不关心历史的场景设置是在公元前四世纪的雅典、1740年代的巴黎，还是在1905年冬天的莫斯科。我只寻求对人类困境的理解，去发现或重新发现对人来说发生了什么、他是谁，以及他与其他人的关系。

查阅古代或现代书籍中的记录，你就能够与几千年来人类的各种美德、恶德、动机、行为、痴迷、后果、快乐和悲伤相遇。帝国灰飞烟灭，城镇不断易手，只有人面对自己必死的事实时发出的声音留存下来。历史学家萨拉·贝克维尔在讲述蒙田生平与思想的新书《如何生活》中，借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口道出：“每一个活生生的心灵都是用与柏拉图和欧里庇德斯心灵完全相同的材料制成的……正是这种共同的心灵联合了整个世界，而世界就是心灵。”

如果将历史同时视为自然资源和应用技术来阅读，那么反抗 G. K. 切斯特顿所说的“那些只是恰好经过历史的渺小而又自大的寡头专制”就成为了可能。切斯特顿的这个观察与乔治·奥威尔的箴言“谁掌控过去，谁就掌控未来；谁掌控现在，谁就掌控过去”是一致的。奥威尔意在论证历史被用作服务于国家的宣传工具，但其实这句箴言更适用于个人。除了自我，这个“谁”还能是谁呢？如果不在历史的阁楼中翻检，人们又怎能找到自我呢？正是这一历史的阁楼为个人心灵的自由和成长提供了空间。远在公元前 50 年，西塞罗就已经指出这一点：“不了解发生在自己出生前的事，这样的人永远是一个孩子。”

正是对过去的无知招致对现在日益加深的绝望，绝望又带来没有出路的政治营销，竞选广告永远在悲叹失落的黄金时代。通常情况下，怀旧式的推销手段（山边的城市，金黄色的麦浪，雄伟的青色山脉）只是保守现状的发明，后者从一个想象中的昨天借来次级贷款，用来投机一个补偿性的明天。

因此，在 2010 年的价值观选民峰会（Values Voter Summit）